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人文与社会译丛

运动中的力量

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Sidney Tarrow

[美国]西德尼·塔罗 著 吴庆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运动中的力量

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美国]西德尼·塔罗 著 吴庆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美)塔罗(Tarrow, S.)著;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2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Power in Movement: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SBN 7-80657-977-X

I. 运... II. ①塔... ②吴... III. ①社会运动-研究 ②政治斗争-研究 IV. ①C916 ②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1687 号

Copyright © 1998 by Sidney Tarrow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3-096号

书 名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作 者 [美国]西德尼·塔罗

译 者 吴庆宏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77-X/1·695

定 价 23.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逐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1993年《运动中的力量》第一版完成以后,在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领域又发生了很多事件,其数量之多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任何一个五年内的事件总和。尽管1989年有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但其教训尚不足以立刻在学术性著作中得到反映。那些以和平为主的运动造成的却是若干国家的不稳定,有时还引发反复无常的暴力运动,甚至在前南斯拉夫导致一场野蛮的国内战争。所以,我在本版中试图把从这些转变中得来的教训也吸纳进来。

1989年和其后发生的事件虽然也证明了我第一版最后一章中的某些暗示,却不能支持跨国斗争迅速扩散这一论点。我对无国界之分的运动世界的预测,仍然持谨慎的态度。不过,特别在西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洲联盟可能会引发新一轮跨国运动。甚至在西方国家之外,跨国倡议网络也已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民族社会运动。这些变化如此显著,本版为此特别单列了一章进行论述。

其实,自《运动中的力量》第一版发表以来,研究社会运动和斗争政治的学者一直很活跃。在欧洲和北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新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涌现。在这一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好几套新丛书已经面世,同时还出现了一本完全致力于斗争政治研究的新杂志——《动员》(*Mobiliza-*

tion)。我因此得以在本版中借鉴若干最近发表的著作,如唐纳泰拉·德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所著《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所著《抗议的社会心理学》、汉斯皮特·克瑞埃西(Hanspeter Kriesi)和他的合作者所著《西欧新社会运动的政治》、阿尔贝托·梅卢齐(Alberto Melucci)所著《挑战规则》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著《英国的群众斗争》。本书第二章的结构与剑桥出版的一本比较政治研究论文集《对社会运动的比较观察》相近,这得感谢该论文集的编辑者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约翰·D. 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梅耶·N. 扎尔德(Mayer N. Zald)。

我们是否正生活于一个“运动社会”? 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说自己知道答案。不过,我在新的结尾中提出了若干问题,并对它们的含意进行了解释,比我五年前说得更透彻。而如果说本版有助于向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和学者阐明运动社会的问题,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和戴维·迈耶(David Meyer)在出版最新论文集《走向一个运动社会:新世纪的教训》时的合作。此外,我还得感谢马克·利齐巴奇(Mark Lichbach)和汤姆·罗尚(Tom Rochon),他们为本版的初稿提供了颇具文化敏感和睿智合理的评论。

随着新的社会运动在世界上的产生,学者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究,我个人的观点也随之起了变化。自《运动中的力量》第一版问世以来,我一直试图了解社会运动理论是如何延伸到对斗争政治的一般研究、西方民主之外的领域和对革命的综合研究中的。为此,我参加了一个联系密切的学者研究网络,并获益匪浅。我和其他学者在梅隆基金会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合作研究斗争政治。我们共同思考,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互相启发,最终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这个

项目中与我合作的麦克和 T2 两位,他们帮助我进一步澄清了社会运动和斗争政治之间的概念关系;为此,我很感谢他们。 xii

致 谢

和社会运动一样,一本书的创作也是一次集体行动。在作者和题目等明确标示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段学术研究与合作的漫长历程。本书实际包含了尤为长期的集体努力,得到了若干机构和个人的多方支持,而这却是封面标示上看不到的。

我对社会运动的好奇始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伯克利不仅是培育社会运动活动的温床,也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提供了富于创造和竞争的环境。我在那里学习研究时,得到了戴维·爱普特(David Apter)、已故的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埃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和约瑟夫·拉帕罗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四位老师的指导,结果写成了《意大利南部农民共产主义》一书。

一般对社会运动历史感兴趣的人迟早都会去巴黎。我于1969年到了法国政治生活研究中心,迎接我的法国同仁都是非常乐意帮助我的朋友,他们在不经意间帮助我形成了本书中所表述的思想。我特别感谢已故的安尼克·佩尔什隆(Annick Percheron)和盖伊·米舍拉(Guy Michelat)、雷内·莫里奥(René Mouriaux)和弗朗索瓦·苏比洛(Françoise Subileau)等,他们帮助我以CNRS学会特别成员的身份于1990年在巴黎度过了富有收获的一学期。我还十分感谢巴黎大学的达尼埃尔·塔达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她毫无保留地给我讲了关于法国

历史斗争的大量知识。

本书的许多思想都来源于我对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意大利运动的研究。我于 1980 年到 1981 年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院高级进修中心颇有成效地学习了一年,随后又从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两项资助,从而写成了《民主和混乱》一书。

xiii 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之所以能实现这个转变,得感谢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的帮助,是它们给我提供了从事阐释性研究的基金。我从美国的“德国人马歇尔基金”获得的资助,也有助于我研究国际政治和国家运动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还在 1985 年到 1996 年间为大学教师举办了四次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暑期研讨会。通过这一渠道,我大大拓展了研究思路。我感谢参加研讨的四十八位同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萌发了本书中的许多观点。而在所有参加了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的人中,我又特别感谢道格·伊米格(Doug Imig)和戴维·迈耶,他们后来都成为我最珍贵的合作者和朋友。

同时,我也衷心感谢那些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替我阅稿的同行,包括唐纳泰拉·德拉·波塔、马里奥·迪亚尼(Mario Diani)、比尔·盖姆森(Bill Gamson)、玛丽和皮特·卡赞斯坦(Mary and Pter Katzenstein)、伯特·克兰德曼斯、汉斯皮特·克瑞埃西、道格·麦克亚当、戴维·迈耶、弗兰西斯·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迪特·汉希特(Dieter Hancht)、苏珊·塔罗(Susan Tarrow)和理查德·瓦勒里(Richard Valelly)等,他们分别就我第一版原稿的所有或部分章节提出了详尽而颇有创见的看法。格伦·奥尔舒勒(Glenn Altschuler)、罗恩·艾米塞德(Ron Aminzade)、本·安德森(Ben Anderson)、戴维·布拉特(David Blatt)、斯图亚特·布

卢明(Stuart Blumin)、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肯·布什(Ken Bush)、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玛丽亚·库克(Maria Cook)、林恩·亨特(Lynn Hunt)、道格·伊米格、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Keck)、戴维·科泽(David Kertzer)、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约翰·马尔可夫(John Markoff)、戴缪德·马格雷(Diarmuid Maguire)、保琳·迈尔(Pauline Maier)、格里·马维尔(Gerry Marwell)、约翰·迈耶(John Meyer)、乔治·摩西(George Mosse)、维克托·尼(Victor Nee)、帕姆·奥利弗(Pam Oliver)、克里斯·鲁茨(Chris Rootes)、比尔·斯维尔(Bill Sewell)、马克·斯坦贝格(Marc Steinberg)、安妮·玛丽·齐曼斯基(Anne-Marie Szymanski)、莎拉·塔罗(Sarah Tarrow)、马克·特劳戈特(Marc Traugott)、乔治·泽比利斯(George Tsebelis)和周学广(Xueguang Zhou)等也审阅了各章节或各章草稿。其中,本·安德森(Ben Anderson)始终是个敏感而富有挑战性的评论家,他的著作恰是“模式化”(modularity)概念的来源。我对这些朋友和同行深表感激。如果我没有能吸收他们给我的所有知识,我也在这里也向他们表示歉意。

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许多同事为本书作出了贡献,大大地增加了它的价值。尤其是吴桑(Sung Woo),他和安尼塔·李(Anita Lee)、小泽知子(Tomoko Owazawa)及安德烈·皮尔斯(Andrea Pierce)查找不太重要的参考书,校对拼写,并列出了各个章节的参考书目;莎拉·苏尔(Sarah Soule)则由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友好而敏感的合作者、评论者和编辑者;伊娃·罗塔·海德曼(Eva Lotta Hedman)使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实用性不应该局限于欧洲一角和北美;利内特·哈维(Lynette Harvey)、卡罗琳·林恩(Carolyn Lynn)和卡雷尔·塞德拉斯克(Karel Sedlacek)的耐心和细致也令我不胜感激。

我还要特别感谢查尔斯·蒂利、皮特·兰格(Peter Lange)和玛丽·卡赞斯坦三位学者,因为他们在本书的构思和完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查尔斯·蒂利在其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形成了斗争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方法,从而表明:社会研究可以既受理论驱动,又不超出历史;皮特·兰格远不只是剑桥比较政治系列丛书的主编,他别具一格地把理论的严密和政治的敏锐结合起来,对我进行鼓励、诱导、刺激和督促,并给我提了不少建议;玛丽·卡赞斯坦提出了许多深思熟虑和令人振奋的建议,却并不把xiv 她的观点强加于本书。

最后,我要感谢苏珊·塔罗,她总是每日被隔壁房间传来的计算机键盘敲击声所吵醒。她已记不清这样过了多少年,这种声音一直陪伴着她,从伊萨卡岛到埃尔巴岛、佛罗伦萨、牛津、巴黎(二次)、(非常潮湿的)凯尔西和悉尼等地,从没有中断过。计算机不能理会她的痛苦,我则永远感谢她对我的忍耐和关爱。xv

目 录

图表目录.....	3
前言.....	1
致谢.....	1
导论.....	1
一 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	13
第一部分 现代社会运动的诞生	
二 模式化集体行动.....	39
三 出版和结社.....	59
四 国家创建和社会运动.....	74
第二部分 从斗争到社会运动	
五 政治机遇和限制.....	95
六 斗争行动	122
七 构造斗争	142
八 动员结构和斗争政治	165
第三部分 运动的动力	
九 斗争周期	189
十 争取改革	216
十一 跨国斗争	237
结论:社会运动的未来	263

注释·····	283
参考文献·····	306
索引·····	351

图表目录

2.1 西欧和北美的“旧”和“新”斗争手法	43
5.1 前苏联 1987—1992 年间游行示威的抗议动员	99
5.2 政府力量和主要战略——一些西方民主国家 斗争政治的组织原则	109
6.1 1996 年 11 月 19 日至 1997 年 2 月 12 日 贝尔格莱德抗议事件的参与情况	124
8.1 运动相关组织的类型	183
9.1 1848 年每月大事记, 1847 年 3 月—1849 年 8 月	203
11.1 跨国集体行动的分类	248

导 论

1997年3月17日《国际先驱论坛报》首版报道,欧盟拒绝派部队去阿尔巴尼亚收拾一项金融计划失败造成的严重局面: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公民破产,抗议者和暴徒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发起暴乱,洗劫军火库里的枪炮和坦克,阿尔巴尼亚武装部队瘫痪,政府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注意到,这一事件令人不安地与90年代早期南斯拉夫的分裂相似,并可能还使人联想到:阿尔巴尼亚危机大概是由当年初在塞尔维亚爆发的和平运动触发的,在那次和平运动中,上万名抗议者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确认反对派在地方选举中的胜利(见第六章)。

同一期《国际先驱论坛报》还特别报道了世界上与社会运动、抗议及叛乱相关的另外七条消息。首版同时报道了扎伊尔东部发生的武装叛乱,以及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工人为抗议最近比利时一家汽车制造厂关闭而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见第十一章)。第四版报道了两万泰国穷苦百姓为反对一项政府开发计划举行的和平抗议游行,还有印度尼西亚对立民族群体之间发生的一次暴力冲突;第八版简要报道了阿尔及利亚军队和伊斯兰教武装分子之间发生的一场枪战,双方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处于野蛮的内战之中;再就是萨尔瓦多的选举,从前的游击运动组织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被允许进入政府;就连第

十五版商业信息也离不开斗争,描述了面临失业的德国矿工前一周的抗议活动。一份普通的新闻日报竟然包含近十条关于斗争的新闻,涉及从比利时到婆罗洲这样完全不同的地方,这表明了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力量持续存在。

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

上述事例表明,现在普通民众常常会突然冲上街头,企图用斗争手段反抗国家或敌对势力。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广大民众就多次走上街头,要求变革,先后发动了美国民权运动、和平运动、环保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及欧洲和第三世界的反独裁主义运动。他们在斗争中取得了不少成功,而即使他们的行动遭到了失败,也仍然推动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变革。

一旦普通民众(经常与较有权势的公民结盟)携手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对立者,斗争政治就产生了。虽然这种斗争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之初,但是为了反抗强大的敌对势力而发动、协调和支持这种斗争,却是社会运动(一种现代发明和现代国家兴起的伴随物)的独特贡献。我在本书中论述到,当变化的政治机遇和限制使那些自身缺少资源(resource)的社会参与者受到刺激时,往往会触发斗争政治。一般来说,社会参与者会采取被普遍认可的手法进行斗争,并利用这些手法所留有的回旋余地进行创新,拓展出新的斗争手法。在紧密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激励下,斗争政治将造成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其结果就是社会运动。

那么,普通民众怎样利用由变化的机遇和限制造成的刺激?他们怎样将常规的和富有挑战的活动手法相结合?他们怎样把社会网络和文化框架转换成行动?会有什么结果?在主要的抗议周期(有时是革命)中,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是怎样结合的?